

木鱼山

沙汀

上海文艺出版社

•5

木鱼山

I247.5
1295

沙汀

65.9.13



上海文艺出版社

186909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插图：袁银昌

木 鱼 山

沙 汀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8 字数 117,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0册

书号：10078·3563 定价：0.98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老作家沙汀的新作品。

小说表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造成农村一场严重灾荒的情景。作者塑造了以汪达非为首的一批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动形象。他们大都是土改翻身过来的贫雇农，对党忠心耿耿。眼看农村在工作组领导下不切实际地搞浮夸，瞎指挥，将使来年春天的收成受到影响，抱着“砍脑壳愿挨头刀”的决心，跟工作组展开了在“夹缝里求生存”的暗地斗争。

作品意境高，开掘深。作家以他那深情细致的笔法，把一群基层干部在困难处境中的复杂心理写活了。使人心动、同情，更感到他们的可敬和可爱。“他们面对任何艰难险阻的时候都充满了乐观精神和幽默感！”

—

人们陆续走出食堂，陆续走向外面大院里去了。

这是本镇一个大地主的院落，全院三进，食堂在正屋侧面那间宽敞的厨房隔壁，桌椅俱全，可以供七八十人进餐。前一进大厅两侧的厢房，则是寝室，全都摆着没有漆过的白木的单人床，那些陆续到前院去的农村基层干部，年纪轻点的走向院坝里去打篮球，也有打百分的。年纪大的，则多走进寝室抽叶子烟。

时候是午后一点多钟光景，还有一个钟头才继续开会。当木鱼公社社长，前党委第一书记，现在可以说只有个空头衔的汪达非，走进自己的寝室的时候，他发觉他们社一个生产大队

1

队长贺永年，还照旧呆坐在床沿上纳闷。

汪达非是一位身材瘦长的中年人。一身棉制服虽然下过水好多次了，蓝色已经变浅灰，帽子也绉巴巴的，但是，他的神态安静、正常，不象那个跟他年岁相当的大队长那样萎，拖起久未刮过的两抹焦黄的胡子，似乎万事都不顺心。

他轻轻叹口气，在贺永年对面一张床的床沿上坐下来。

“还是要吃一点呵，——赶快去吧！”他末了说。

“不饿呵！”贺永年闷声回答，用力摇一摇头。

“不要跟肚皮赌气吧，我每顿倒都要胀它两碗！”

汪达非说的是实在话。因为打从五九年起，他也经常被当作右倾保守思想的典型挨批，只是由于两个人经历不同，脾胃性格不同，因而对于挨批的态度也就两样。汪达非的典型性似乎要少得多，原来尽管他们同样都不服输，时间一久，汪达非却总主动承认错误，主动进行检查，而贺永年呢，则始终不承认他有右倾保守思想，流露出极大委屈情绪。

贺永年一直感到委屈。特别因为在去年一次公社临时党委召开的火线整风当中，他不止于被批被斗，还着过打，而且他的右耳朵差点被揪裂口了。还有更叫人愤激的：那些动手动足的是些什么人呢？其中居然有两三个地富和坏分子！当时汪达非不在家，正在县上接受批判。那也是一次整风性质的群众大会，不过参加批判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不是一般社员群众。尽管也有“左”得可爱的人，却绝没有什么人想到打耳光和罚跪。

对于贺永年这次的遭遇，汪达非一想起就感觉难受，因为实际管事的工作组事前曾经打电话征求过他的意见：同不同意群众的要求，把贺永年调到社上批评批评？批评嘛，有甚么不行呢？他立刻同意了。而当他在县上、区上接受过一两年来例有的批判，回到公社的时候，他才知道贺永年在批判会上遭受到的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时想起这事，汪达非总会感到内疚，因为当他赶往二大队第三生产队的时候，才一问起，贺永年就哭了。说他想不通：着地主富农又打又骂！这个一向坚强乐观的人接着说了不少愤

激的话……

然而，现在这些往事早已从他记忆上隐蔽了，他感觉闷气的不是因为这个。

“我赌啥气呵！”他照旧闷声说，“不还个价钱今天走得了嘛？……”

“那又留在这里过年好啦。”

“话倒不错，我只愁明年这个工作怎么搞呵！”贺永年忽然变得来很激动了，他一气接着说下去道，“小春尽管不错，可是现在已经有人在叫唤没吃的了！离夏收又还有多长一节日子，叫大家怎么办？……”

“你们的籽种、贷粮没有动吧？！”汪达非专注地问。

“那个都动得呀？可是已经有人在打它的主意了！……”

贺永年忍不住笑起来，因为对于籽种、贷粮已经垂涎三尺的王长林那副阴沉莫测的面貌，忽然一下那么灵活地闪现在他眼前。而且照例叫人不由得不想起五八年冬天建立公共食堂时他的精采表演：他总担心自己吃亏，因而由于制度还不完备，每顿饭他都尽量地吃，结果肠胃出了毛病，躺了半个多月……

“紧紧裤带也好，”他接着笑道，“免得弄来睡起！”

汪达非完全理解对方这些话的含意，也笑了。因为同样的事情，整个公社发生过好几起，而且，直到现在，每一谈起目前吃食紧张的情形，也总往往免不了联想起它们。甚至觉得自己多么可笑！因为当其五八年开办公共食堂的时候，他是多么兴奋呵：从今以后，再也用不着为困难户操心了！特别是妇女们，大都欢天喜地：“这下不当锅边转了！”哪知道不上一年，食堂就无法办下去了，只能散伙。因为口粮短缺，柴火也成问题，而且经常发生争端！……

他的笑意早已消失，而且长长叹了口气。

“看来吃饭不要钱还得大大展把劲呵！”他接着说。

“就象现在这样搞么，二辈人都靠不住！……”

贺永年愤愤地插嘴了，随即脱口而出地一个劲说下去：“前一两年在粮食生产上说大话吃的亏还没复原，什么‘技术规格’、‘按计划种植’的紧箍咒又来了，恰恰天又捣乱！这么价一来，劳动力也就不断削弱：疾病，外流……”

“我们那个队，可以说没有几个全劳动了！一个个都蔫妥妥的。”

“你多做点思想工作嘛！”汪达非打气说。

“每天增加几两口粮比你啥思想工作有效！”贺永年充满感情地接下去道，“你记得吧，去年春天政府才贷了一些口粮——每人不过二三十斤，大家干起活来那个劲仗！……”

随着一阵阵口笛声和叫喊，陆续有三四位社干从室外走进房来，他们全是木鱼社的干部。那个先一步进房的是个大块头，木鱼社第三生产大队队长，叫赖体臣，年岁比汪达非小不了多少，约有四十光景。宽阔的脸庞上流露出一种调皮捣蛋的神气，老是笑扯扯的。他一进屋就四处扫了一眼，而他脸上的笑意也就更显著了，仿佛忽然发现了什么趣事。

“怎么都闷起脸不张声啦？”他似问非问地随口说。

“莫有你高兴得起来啊！”贺永年赌气说。

“也是该高兴啦！”赖体臣笑答道，“见天两千一稀，——可惜会议今天就结束了！……”

“倒还没那么容易呵！”这答话的是最后走进宿舍的身材瘦小的霍荣汉，混名叫霍干人：第

二生产大队的负责人，“不还个价钱你倒休想脱身！”

“当然！”汪达非笑一笑接口道，“不止是得还价钱，还不能打一点折扣！”

“×！说空话又不要本钱呢！”赖体臣照旧满不在乎。

“我倒准备在这里过年呵！”贺永年心一横说。

汪达非尽管年岁较大，快五十了，因为一向细心，他忽然一眼发现了正在走近房门的工作组副组长李自力：只有二十多岁，架着近视眼镜，满脸洋溢着自命不凡的神色，一眼就可看出是那种积极分子——随时都在磨拳擦掌，准备进行斗争。而一眼发现他，汪达非就警告似地嚷道：“唉！开动啦！”

“怎么还在吹牛皮呵！”同时，副组长已经惊诧诧叫嚷着到了门边。

室内的谈话转眼就停歇了，有的在心里嘀咕道：“看你跳得到好高嘛！”有的翻眼望望来人，立刻避开视线；贺永年脸色更阴晦了，一想起副组长他总立刻充满对立情绪。只有霍干人显得胆怯地望对方笑了笑，立刻收拾材料去了。

赖体臣则照旧嬉皮笑脸，照旧对那位“钦差大臣”采取了那种貌似恭顺的态度。

“吹啥牛呵！”他说，“我们正在打通思想！……”

“通了没有呢？”副组长李自力的态度立刻严肃起来。

“通了！不管县委怎么安排，我们都牵开衣包兜起回去！……”

贺永年猝然爆发出来的讽刺，引得大家失声笑了。

李自力紧接着训斥道：“你少吊点二话哇！”接着却又不屑争辩似地催促大家赶快动身，“走！走！走！”那口气和神态正象呵斥顽皮孩子一样。

然而，除开干人，几个社干部都程度不一地更开心了。当然没有公开表现出来。而干人则不仅不觉得开心，反倒有点忧虑，深恐副组长怀恨在心，将来在工作上找岔子。因为自从这个工作组进驻木鱼公社，他已经领教过这位来自省委派遣的角色的味道了，动不动就来个火线整风：不是批判你右倾保守，就是给你扣上一顶“目无领导”的大帽子！……

现在,几个人终于陆续离开寝室,但都一路嘀嘀咕咕。“说话试到点来呵。”汪达非低声叮咛。“×!他又发动人斗我好啦!”贺永年并不约束自己的嗓门。

“我倒要把这顶‘右倾保守’的帽子永远戴下去呵!”他随又情绪愤激地加上说。

干人抢先离开他的伙伴,紧跟副组长走去了,他显然还没有忘记掉去年火线整风时的遭遇:工作组由于偏信偏听,硬认为他那个大队一些人的病痛、死亡,是他多吃多占,克扣了社员口粮招致的恶果!……

赖体臣也为同样的诬陷遭过斗,而且都先后一两天在同一场合遭的斗。但当那些因为亲人死亡或者身染重病的婆婆大娘,叫他跪下的时候,他却象对付某种过火的作弄一样,笑嘻嘻嚷道:“又不是斗争不法地主呢,咋兴跪啊!”结果既然没有跪过,也没有吃一位新寡的妇女的鞋底板。而霍干人呢,因为深怕触怒群众,群众刚一叫喊就立刻跪下了,最后挨了耳光和鞋底板……

汪达非是最了解干人的脾胃和此时此刻的情绪的。望着对方的背影,他不由得苦笑着叹

口气嘀咕：“一下就变得这么胆小啦！”因为尽管自来谨小慎微，当其还是一名少先队队长的时候，土改期间，他也跟成年人一道揪斗过不法地主，相当勇敢泼辣。

贺永年显然也了解干人，了解他怕沾惹是非，叹息道：“这两年也真把人折腾够了！”这时几个人已经来到了大厅上。他们没有发现干人和副组长，而从其他一些寝室里，则陆续走来一批参加会议的社干。他们大都认识汪达非，因为他同他们中间几位中年人几乎是同时参加工作的。他默默地向他们点点头，笑一笑；他们也用同样的动作和神色还答他。这些点头、微笑蕴藏着的含意，只有深知那些年农村工作的艰苦的人才能理解。它们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复杂的：埋怨、委屈、逆来顺受和无可奈何；想说真话而又只能默不作声的痛苦、内愧……

其中，一个约有五十上下年纪，满脸的胡茬，身材中等、骨格宽大的同志，向汪达非顺势挨近身来，悄声问道：“你准备发言吗？”“没有啥说的呵。”“我也只带了耳朵来。”于是嗽嗽喉咙，不张声了，一道同其他社干去礼堂开会。

这礼堂是在同一条街道东头另一座大院

里。当他们走出大门，跨上大街的时候，立刻引起那些守在店铺里、饭馆里和穿过市街的各色人等的注意。这些人的神色也跟已往几年不同，大都对他们闪烁着探究和同情的目光。他们自己也有苦恼，生意已经没过去好做了，冷淡了，在这冬天，总经常烤着烘笼，枯坐在柜台边纳闷。当然，在一九五八年的那些热气腾腾的日子里，他们却也着实紧张过一通。到了两双抢季节，因为部分劳力调去炼钢，还曾经下乡支农，帮助社队收获已经开始腐烂的庄稼……

过去两年，曾经一度停止营业的茶馆，也早已开张了。茶馆过去停止营业，是按指示行事，因为县城郊区的农民，每逢三六九上街赶场，卖点自留地里的小菜，总喜欢坐坐茶馆，这就无形间浪费掉不少的劳动力，以致影响生产。可是尽管重新开张，茶客却少。就是逢场赶集，也很少乡下人坐茶馆了。因为自留地已经改种粮食，闲钱也少。只有一两家中药铺比较热闹。看吧，一个面貌浮肿的老头儿，拄根竹棍，一步一歇地正在跨上泰山堂的阶沿。

这病人是城郊前进公社的会计，曾经到木鱼公社做过辅导工作。由他培养出来的木鱼公

社的两三个小会计，一直把他当成老师看待；遇到逢年过节，汪达非也总要催促那两三个青年人：“你们也该去看看你们的老师呀！”这时，一眼望见这老会计，汪达非走过去招呼了。招呼之后，他安慰老人道：“气色比上次看见你好多了。”

对方带点苦味地笑笑说：“少说些宽心话呵！”

老会计知道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多少好转，他的口气因而不免有点伤感。但他忽然显得惊诧地一把握住了汪达非的膀臂。

“听说毛主席已经知道我们搞得糟啦？”他悄声问，略显昏浊的眼光紧紧盯住对方。

“总有一天他老人家会知道嘛。”汪达非抑制地叹息说。

老会计抓住对方膀臂的手，一下松了，也没有再望汪达非一眼；但却带点失望的情绪自语道：“看来罪还没遭够呵！”又照旧磨磨蹭蹭走向药铺。那里已经有三个同样的病号了。

老会计的情绪，汪达非很理解，因而并不见怪。原来“总有一天他老人家会知道的”这句话，近一年来，随着人们失望情绪的增长，他自己就

已经说过无数遍了。用来鼓舞那些陷在困苦和怀疑里面、他又信任得过的人们。今春以来，有时他也默默用它来鼓舞自己。近来，他对自己这个坚强朴素的信念，似乎多少也有点动摇了。这使他相当痛苦。因为这里那里都有肿病；还有饿死人的传说，他老人家会不知道？但又认为这样想是一种褻渎。……

他也想过，他应该向上级如实反映一下本县的情况，但他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地、县两级的领导同志经常到下面检查工作，难道他们一点不了解实情？而且目前驻社的工作组，不就是省委派遣的么？！纵然是反映了，省委也会要工作组复查呵！自从五十年代初入党以来，他住过三四次地委、县委办的党训班了，学习过党章，知道他有权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申诉。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基层干部这样做过！而一些旧的传统更加叫他不该轻举妄动。于是这个曾经在解放后各大运动中勇于冲破一切网罗的共产党员，一下变成了听天安命的某些党组织的驯服工具，……

望着老会计的背影轻轻叹一口气，汪达非跟随他的伙伴笔直走过去了。